

汪耀明 著

西汉文学思想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汉文学思想

汪耀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责任编辑 吴德润

责任校对 陆宏光

西 汉 文 学 思 想

汪耀明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永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字数 165,000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309—01265—8/I·98

定价: 10.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结合西汉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文学思想发展进程，论述《诗大序》、《礼记·乐记》、《淮南子》中的文学理论；分析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著作及各家辞赋、散文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并指出其形成的基础、特点与影响。本书占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力图对西汉文学思想加以总结、扬弃，立论谨严、辩证、公允和有一定的独到见解。

《西汉文学思想》序

——兼述一些关于西汉政治、
经济、文化的断想

顾易生

“大风起兮云飞扬”！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巩固强盛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秦朝统一后迅即土崩瓦解）。辽阔的神州大地上，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了巨大精神、物质力量，进行艰巨的建设创造，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培栽出丰硕灿烂的果实，其汁液滋润祖国土壤千秋万代。西汉文学思想是这辉煌时代所结的硕果之一，汪君耀明试图加以总结、批判、阐扬，是需要相当功力的，希望其辛勤努力成果能有益于我国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

西汉政权创建者“以马上得天下”却并不以马上治之。首先约法三章，除秦苛政，刘邦倾听陆贾《新语》，萧何制定划一的法律，曹参师承黄老学派的盖公，实行“慎”“勿扰”“狱市”（《史记·曹相国世家》）方针，也即是坚持法制的稳定与保护商业经济。《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短短一行，易为读者忽略，却是标志西汉王朝经济开放的画龙点睛之笔。《史记·货殖列传》曾以如椽彩笔描绘了在这安定的大环境中，各地丰富的劳动成果通过商品流通而满足全国需求的情景，并云：“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各种积极因素，

自然充分调动起来，经历七十余年，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与民间财富积累空前殷实：“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凭藉如此雄厚人力物力，汉王朝得以攘匈奴、通西域，开发西南与东南，大兴土木与水利，留存到今天的瓦片，也还显示出一种雄伟气派，引起人们追想当年壮概。

西汉初期在开放经济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开放。它废除秦朝挟书之禁，广开献书之路，当时学术活动、文学创作的大环境也是宽松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中一些主要学派，经秦火中断之后，拭去身上灰烬，得到恢复与发展；而统一的山河，更为各学派的交流、融合、创造提供合适场地。南方惊采绝艳的楚辞进入中原与纵横雄辩的散文相结合，酝酿成亦韵亦散、宏壮而博丽的辞赋。枚乘气势磅礴、波澜迭涌的《七发》为汉大赋的先导，其卒章云：“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则又表现出当时对儒、道、杨、墨诸家学说兼收并蓄、综合利用的宽博胸怀。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举阴阳、儒、墨、名、法诸家之短长而都以肯定为主，最后推道家为能集其成而不拘一格：“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此道家自非先秦道家，乃西汉盛行的黄老思想，力图融会众长而加发展，这是相当通达的态度。煌煌巨著更是只能在西汉这块伟大沃壤上的产物。司马迁凭藉汉兴近百年安定发展的社会条件下的文化积累、家学渊源、深厚的学养与激发的志气，亲身考察祖国各地进行广泛访问、调查研究，博览国家搜集的大量藏书和档案资料而独立思考、排比考

订；所以能够“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亡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皇冠，其成就不仅空前，也非其后诸史所能企及，并非偶然。东汉班固就曾因私撰《汉书》被告发下狱审治，后才奉诏修史。唐代韩愈文才或许可追司马迁，然而他所谓“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答刘秀才论史书》）反映史学领域所受政治社会压力的严重，纵有才情也不容骤驰其笔。官修之史，其作者的感情、个性、“实录”精神，必然大打折扣，甚至扼煞。我曾怀疑司马迁之死可能系遭受迫害，然而他至少在生前独立完成了这百卅篇“名山事业”而未受干扰，死后也未闻明令禁毁，虽有“谤书”之称，除十篇佚失或有被削者外，绝大部份均得传诵千古，则其时文纲当还比较宽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专制主义和思想统制确实加强了，但诚如汪君本书中所说：“一些具体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西汉盛世的统治阶级比较“还能够兼容并包”，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中“包括战国以来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各家观点”。《汉书·艺文志》载，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记皆充秘府”。成帝时使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等“校经传诸子诗赋”及“兵书”“数术”“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哀帝复使向子刘歆总群书而成《七略》。班固《汉书》中《艺文志》即依《七略》而作，其《诸子略》云：

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对各种学派还是保持宽容辨证的态度，这是西汉文化学术文学盛极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试看汉昭帝六年举行的盐铁会议，

召集了各地贤良、文学许多人士，与政府官员桑弘羊进行关于国家盐铁政策进行辩论，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攻击对方，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事后其说两存，未闻对论争某一方戴什么帽子、定什么性。桓宽整理会议资料为《盐铁论》，借鉴汉赋主客问答形式，对尖锐激烈的相互诘难绘声绘色，生动而翔实，不仅是非常珍贵的思想史、经济史文献，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足证这次的讨论是充分自由的，此书的叙录也是相当自由的。

汉初萧何营造未央宫，即以“壮丽”为其建筑的主导思想（见《史记·高祖本纪》），这也反映西汉文豪们的审美观念。西汉文学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崇伟巨丽的宫殿，受到唐代古文大家的极力推崇与向往。唐柳宗元《西汉文类序》说：“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文心雕龙·体性》说：“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这里所谓“文”，包括散文与辞赋，包括政治文献、学术论著与文艺创作。这观念并非削弱文学创作的艺术性而是揭示西汉一些政治文献、学术论著的巨大艺术魅力。正如鲁迅称贾谊、晁错政论“皆为西汉鸿文”、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郭沫若认为“不把”《盐铁论》“看成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诧异的”。他又说：“《盐铁论》是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它要求我们的文学史家应该予以适当的地位。”（《盐铁论读本》）这类杰作雄文是不应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的！

治文学批评史者，常谓魏曹丕《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为标志“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然而西汉《史记》评司马相如赋的特色为“靡丽多夸”，扬雄《法言》更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则以“丽”为赋，殆已属前汉作者的共识，为曹丕之论的先声。而“丽”上突出一个“壮”字，则为汉唐大一统时代精神的体现，非割据英雄的看家之子所能具有了。

近代以来，对西汉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工作相形做得不够，

近年虽有几部有关著作出版，总体来说，尚未焕发其原有光辉。本书著者汪耀明君钻研汉代文学多年，用力甚勤，也有自己会心。其一九八七年硕士毕业论文即为《论贾谊及其散文辞赋》，这部《西汉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他一九九二年博士学位论文，与近年出版的同类著作差不多同步着手撰写，诸书中当然有若干“所见略同”者，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序志》所谓：“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有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汪君此书，也自有不少独到见解，例如关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般论者几乎一致推崇无异辞，汪著中则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指出这一著名论点也有偏颇之处。书中引用桓谭《新论》所云：“淮南(刘安)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俊士使著书作文”。说明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未尝不是从事著作的一种条件，著书未必尽出穷困。又指出《史记·贾生列传》惟载贾谊迁谪时期怨愤所作《吊屈原赋》与《鵩鸟赋》，而贾氏许多对西汉政治产生巨大作用的“鸿文”均付缺如，这便没有能全面地反映这位大作家的精神风貌。这些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试想司马迁如果没有“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优越条件，哪有可能写出《史记》来呢？如果把“诗穷而后工”之说推向绝对化的话，我们今天还要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干什么呢？著书当然需要有激情，但任凭个人情绪所左右，笔下也会出现偏颇的。

今汪君这部论著即将出版，拉杂记述一些对西汉社会背景与文学发展的粗浅观感，忝附卷首，诚恳地期望与本书一并得到专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九九三年八月

目 录

《西汉文学思想》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西汉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8
第一节 西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	8
第二节 西汉辞赋和散文的发展.....	14
第三节 先秦文学思想的影响.....	17
第二章 《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的诗乐理论.....	23
第一节 《诗大序》.....	23
第二节 《礼记·乐记》.....	29
第三章 《淮南子》的文艺思想.....	36
第一节 《淮南子》.....	36
第二节 无形无音，顺应自然.....	37
第三节 文与质，文与情.....	41
第四节 君形者.....	46
第四章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50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50
第二节 成一家之言.....	53
第三节 发愤著书.....	59

第四节	文艺的作用	64
第五节	评价作家与作品	69
第六节	司马迁文学思想对班固文学思想 的影响及两者的不同	75

第五章 刘向的文学思想 85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85
第二节	符合经义	87
第三节	诗文的美刺作用	90
第四节	忠诚通乎金石	94
第五节	谈说之术	97

第六章 扬雄的文学思想 100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100
第二节	明道、征圣、宗经	101
第三节	文质关系及其他	106
第四节	评论辞赋与作家	113
第五节	扬雄文学思想对桓谭、王充、班固文论的 影响	118

第七章 西汉作家辞赋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125

第一节	以形象性为文学的基本特征	125
第二节	力图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126
第三节	积极讲究修辞艺术	128
第四节	侧重表现生活与时代	130
第五节	重视辞赋的讽谏作用	133
第六节	价值与意义	135

第八章 西汉作家散文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139
第一节 注重描写人物形象.....	139
第二节 追求情文并茂,崇尚雄文宏篇.....	143
第三节 注意反映社会生活.....	147
第四节 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	151
第五节 影响与地位.....	154
第九章 西汉文学思想的特点	157
第一节 强烈的现实性.....	157
第二节 重情感论诗文.....	161
第三节 朴素艺术辩证法因素.....	163
第四节 学术和文学的区别.....	165
第五节 文艺革新的认识.....	167
第六节 依经立论.....	170
第十章 西汉文学思想的重要影响	172
第一节 《诗大序》的影响.....	172
第二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177
第三节 扬雄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的影响.....	185
主要参考书目	189
后记	194

绪 论

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西汉时期是其重要演进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学思想吸收先秦文学思想的丰富营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较大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为后代文学论著的大量涌现、文学批评的进一步成熟与文学思想的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

西汉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变化，除先秦文学思想的影响外，更与当时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辞赋散文创作等发展情况有密切的联系。西汉初期，经济逐渐好转、社会的粗安局面和思想文化比较自由的环境使作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其间不少抒情辞赋和理论著作(其中有关文学的意见)，就反映出这种风气。武帝、宣帝时期，经济的繁荣成为学术文化发展的基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为当时人们创造了大有作为的环境，作家的精神生活大大丰富。他们意气风发，奋笔挥洒，反映时代，议论人物，评价诗文。统治者名义上崇尚儒家，实则融合诸子学说，爱好文学艺术，奖励辞赋散文作家。以后儒学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演变。西汉后期，经济衰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危机四伏，而经学却极盛。不少作家作赋撰文，抨击腐败，批判现实，进一步从儒学理论出发，表达各自的文学见解。先秦经传和诸子中的“诗言志”说、吴季札观乐的评论，儒家关于“文”“质”兼备、诗歌“兴”“观”“群”“怨”的作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明道”“征圣”“宗经”的宗旨，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等等遗

产，均为西汉作家与理论家所继承，并进一步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新观点，使古代文学思想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

西汉文学思想主要是从当时一些学术论著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其中有的是专门的文学论说，有的是作家作品评论，有的是作者自述文学观点的文章，还有的是呈现文学思想倾向的辞赋散文。它们相辅相成，充分展示出西汉文学思想丰富多采的面貌。

《诗大序》、《礼记·乐记》和《淮南子》中部分篇章是西汉文学理论的代表作。作为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诗大序》进一步阐明诗歌的本质特征，倡言抒情言志说；强调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注重诗歌的教化作用；总结诗歌的体裁与表现方法，提出六义说。它吸取先秦儒家有关诗乐的意见，论述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并提出一些新观念，构成比较系统的理论，可以说是从先秦到汉代儒家诗论的总结。与《诗大序》专门论诗不同，《礼记·乐记》集中论乐，涉及音乐的本原问题，提出物感心动的理论；阐述音乐的美感，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情感的真挚，发表“唯乐不可以为伪”的不刊之论。它概括从先秦到汉代的儒家乐论，实际上论述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综合艺术的问题，体现当代人们有关文学的思想，有新的建树与真知灼见。与《诗大序》和《礼记·乐记》相比，《淮南子》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它提出无形无音的主张，要求顺应自然变化，推崇朴素自然之美，批评虚情假意，反对雕饰过度；注重质美又不排斥文饰，强调文与质相结合、文与情相统一；较早地涉及文艺创作中的形神问题，鲜明地提出“君形者”的著名论点。它继承先秦诸子主要是道家以及儒家的文学思想而有提高，发表不少精辟见解。自然，上述论著也有其偏失与不足之处，《诗大序》认为作者抒发感情不能超出礼义的标准，讽刺时政不能触犯统治者的尊严；《礼记·乐

记》指出只有大德圣人才能知道极乐之理和制作礼乐；《淮南子》对儒家诗书礼乐的批评不无偏见，而对道家学说中某些不利文艺发展的观点又有承袭与发展等。

司马迁、刘向、扬雄是西汉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他继承《春秋》笔法，褒贬人事；著作《史记》，描绘宏伟壮阔的历史和现实图景，塑造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还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历史人物经历磨难、著书立说的情况出发，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这一观点揭示进步作家与黑暗现实的矛盾，肯定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学为社会服务。他首次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由此可见，他不仅以文学创作表明见解，还以文学评论阐述观点。司马迁文学思想对班固文学思想有所影响。司马迁反映现实和褒贬善恶的思想、写人传神和叙事精采的特点、关于文学源于生活的认识、有关文学为时代政治服务的主张以及对屈原作品等的肯定意见与评论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班固的创作与理论，当然，两人之间也有分歧。班固撰写《汉书》，记载西汉一代史事，是继司马迁《史记》后的史学、文学力作。比较班、马或《史》、《汉》文学思想上异同，对于认识司马迁及西汉其他作家的文学思想有其重要意义。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思想的进步之处，而从《汉书》对《史记》的补充中，也可以发现《史记》的不足之处，继司马迁之后，刘向、扬雄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各有所长。刘向校定诸书，写出叙录，又辑录旧文，著有《新序》、《说苑》等书，从中表达出自己的文学见解。他记载许多关于诗歌、音乐、言谈的资料，重视学术与文学；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现实意义，肯定符合经义的文章，要求诗文对政治发挥积极的作用；继承前人诗

乐抒情言志的理论又有发挥，提出“志诚通达乎金石”之说；探讨言谈论说的技巧，指出语言文辞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司马迁文学思想开创西汉文学理论的新局面，那末刘向这些文学观点又给西汉文学思想注入新内容，它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继续，又是扬雄文学思想的先导。扬雄早年非常喜欢和积极写作辞赋，后来撰写《太玄》、《法言》等理论著作。他进一步完善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理论，特别强调明道、征圣、宗经，并融合诸子学说。他论述文质关系及其有关问题，提出华实相副、事辞相称、心声心画、弼中彪外以及因循革化等说法。他又评论辞赋的得失，重视辞赋的讽刺作用，批评汉赋创作中忽视内容、偏重形式的不良倾向，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还对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评价。扬雄的文学见解成为西汉文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司马迁、刘向、扬雄的文学思想也存在各自局限。司马迁把创作动因完全归结为怨愤也不太全面。刘向进发步崇尚儒学，注重教化。他谈论天命与谴告，要求对诗文所抒一的真情实感加以理性的道德规范。扬雄的理论不无保守因素与复古色彩，他崇尚“文必艰深”说，不能正确理解屈原的斗争精神与屈赋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不能全面评价一些颇有成就的辞赋家，也不能真正认识汉赋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辞赋创作所反映的思想是西汉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汉赋蔚为大观，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称于文学史。西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都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辞赋家。他们的作品凭借当时雄厚的经济条件、强盛的国力和先秦积累的思想文化遗产，成功地描绘了西汉的时代景象，表现出空前的规模与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反映出一些文学思想倾向和文学理论主张，充分显示出崭新的气象。它们比较注意文学的形象性问题，注重以优美的语言、形式抒情说理，追求铺陈夸张与细腻描写，重视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风貌，强调讽谏等。它

们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一些辞赋家运用如椽彩笔描写不少人物形象与有关的生活情景的图画，力图在创作中做到情文并茂，以反映经济繁荣、国家强大的西汉社会，表现了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同时也批判了统治者的淫逸无度、压抑人才，讽谏他们兴利除弊、修明政治。不过，某些辞赋创作呈现出忽视真实感情与讽谏内容、片面讲究形式与词藻的倾向。

散文创作所表现的文学思想倾向是西汉文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当时散文兴盛，作者众多，其中如贾谊、司马迁、刘向等都是文才渊博的散文大家。他们有的主要议论政治得失，积极提出治国建议，有的系统总结自古以来历史文化发展的情况，深刻反映当代社会现实，认真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的详细论述先秦西汉各家的哲学思想，还有的侧重记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他们的散文别具一格又富有文采，议论疏直激切，叙事曲尽其妙，写人维妙维肖，抒情动人心弦。西汉散文创作充分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和文学的发展，也自然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文学观点。他们注重描写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积极探讨修辞艺术，力图达到情文并茂、语意两工的艺术水平；崇尚描写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高度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为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等。这些思想观点有助于当时文学的繁荣和文学理论的丰富。

西汉文学思想随时代变化、创作繁荣而发展，涉及文学艺术理论的各个方面：首先，反映现实是西汉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与文学思想的主要特点。贾谊为解救汉初社会的燃眉之急而痛哭流涕。他的多数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与现实性。董仲舒认为诗乐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他的一些作品描写不少民生疾苦和贫富不均的问题。这种创作倾向与理论主张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其次，重视思想感情是西汉文学理论的鲜明特色。《诗大序》提出抒情言志说，把言志、抒情二者结合起来论述诗歌的特征。司马迁特别强